

老一代
革命家的故事
之六



吴玉章的故事

卢军 赵云华 蔡开松

中共党史出版社

《老一代革命家的故事》之六

吴玉章的故事

卢军 赵云华 蔡开松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主 编 石仲泉 陈登才

副主编 冯世平 沈丹英

主 编 寄 语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奋斗传统的伟大民族，数千年来涌现了众多杰出的风云人物。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上，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一大批仁人志士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成功地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但是并没有找到真正解救中国的出路。直到 1917 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并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世界东方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本丛书介绍的老一代革命家，大都经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这个奋斗过程。他们是一代英才，国之瑰

宝，有着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历史故事，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若干个重要侧面，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他们执著追求真理，为国为民的无私无畏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克服困难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等等。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老一代革命家前仆后继，奋斗了一生。今天，可以使他们慰藉的是，我们中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15 年，是近现代中国 150 年来政治昌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最快、步入富强康庄大道的 15 年。作为后辈，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应当接过老一代革命家手中的“接力棒”，继续谱写历史新高篇，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努力奋斗。

由于编者学识和写作水平所限，这套丛书肯定有不少缺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主编《四川》杂志	1
革命军火商	9
烽火起故园	19
智勇平内乱	30
誓不低头	36
喋血南昌	46
撤离重庆	55
为国护英华	67
淡泊一生	78
附：吴玉章生平简介	88

主编《四川》杂志

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在日本成城中学读书的吴玉章参加了会议。因他在留日学生，特别是四川籍的留日学生中影响较大，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的评议员。

同盟会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较大的有1906年12月的湖南萍（乡）浏（阳）醴（陵）起义，1907年上半年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钦（州）廉（州）潮（州）惠（州）起义，1907年7月6日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等。这些起义因种种原因，都失败了。清政府残酷镇压各地起义的同时，对国内革命党人创办的报刊等也大加摧残，并加强了国外报刊的检查，如《民报》这时就很难运进国内了。于是留日学生中各省的革命同志，纷纷以本省名义创办报刊，采取分散的方式运进国内，进行革命宣传。

1907年下半年，几个四川籍的留日学生也在东京

商议办刊一事，决定将四川留日学生办的《鹃声》杂志改名为《四川》杂志，由吴玉章来主持这件事。

吴玉章没有推脱。他这时已是日本国立大学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二年级学生，被循例补为官费留学生，学费不成问题了。他就将全部心身投入到办刊活动上。

《四川》杂志的社址在东京。筹办过程中，吴玉章每天从冈山坐火车到东京，路上要花半天时间，而且很累。开始还无所谓，时间长了渐感体力不支，而且耗费了宝贵时间。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称病休学一年，到东京专门从事办刊工作。休学后，他在东京以《四川》杂志社名义租了一处大房子，在这里工作和休息。后来，这儿也成了革命党人的联络地点。

1907年底，《四川》杂志与读者见面了。它一问世，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销量很大，每期出版不几天就要再版。吴玉章、雷铁崖、邓絜等杂志社同仁看到刊物这样受欢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就在吴玉章顺利地创办《四川》杂志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遇到了极大困难，经费吃紧，眼看办不下去了。《民报》主编章太炎是浙江人，另一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派人到南洋去募捐，因南洋华侨跟孙中山1894年创办的革命组织兴中会联系较多，与光复会没有什么联系，结果没有募集到钱。章太炎平时与孙

中山有些隔阂，因此大骂孙不支持他办《民报》。这时，孙中山在国内发动的武装起义一个一个地失败，自己的处境十分艰难，确实是沒有精力来顾及《民报》了。

吴玉章了解到这一情况，对章太炎说：“你别着急，我替你想想办法。”

章太炎听到这话，十分感激，对他说：“那我就真的指望你了。”

当时留学日本的四川人很多，大多数都参加了同盟会。吴玉章利用自己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进行募捐。大家一听总部机关报无钱继办了，募捐人又是吴玉章，都纷纷捐助。不仅家境富裕的学生积极捐助，家庭困难的学生也尽能力出钱。有的官费生为了尽到义务，竟然把官费折子拿到当铺去换钱，这种爱国热情真是感人。不多久，吴玉章就收到了比较大的一笔钱。他把钱交给章太炎，章太炎连连道谢，说：“同盟会中只有四川人才是好的，才靠得住。”

吴玉章对这句话不以为然，四川人才是好的，难道其他地方的人不好？他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还说，章太炎的话“虽是对四川同盟会员的夸奖，并且出自衷心，但却是错误的。章太炎的门户之见过深了，所以到处都流露出来，难怪其后来走向分裂革命的道路。”

要办好一个刊物，必须要组织一些好文章。吴玉章组稿时一般都很顺手，革命党人有文化，革命热情又

高，打个招呼，文章就送到杂志社来了。但也有例外。一次，他找同盟会员吴鼎昌写文章，吴鼎昌对他不冷不热，坚决拒绝写稿，说：“我看现在还是不要再搞了吧！”

这事对吴玉章刺激很深。老实说，他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同盟会员，精神状态如此消极，投机革命的色彩如此浓厚。当时，孙中山、黄兴主要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不常在日本，那里的革命党人可说是群龙无首。如果让这种消极情绪蔓延开去，真是很危险啊。

想到这时，吴玉章坐不住了。他在抓紧办刊的同时，主动和四川的张懋隆、李肇甫，湖南的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广东的何天炯、熊越山，广西的覃超，江西的王有兰，江苏的陈剑虹，安徽的常恒芳、陈策，福建的林时爽、李恢、郑烈，云南的吕天民、张大义，贵州的平刚，山西的景定成，陕西的井勿幕、赵世钰，山东的丁维汾等人经常联系，不断集会，差不多每省都有人参加，形式上像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的联席会议，起到了交流思想、稳定人心、维系组织机构、保持各项工作照常进行的作用。

当时，吴玉章的大哥吴永枏（号匡时）来到日本，同吴玉章一起住在《四川》杂志社内。吴玉章问大哥为何这时来日本，大哥说，国内的环境越来越险恶，许多会党中的革命分子为躲避清政府的迫害，只好纷纷逃亡日本。吴玉章捕捉到了这一信息，赶忙找焦达峰等人商

量，说最近一个时期，同盟会只顾搞武装起义，差不多把会党工作给忘了，现在何不趁各省会党都有人在日本，把全国所有的会党通通联合起来？

曾与会党有过联系的同盟会员知道会党有着巨大的革命潜力，赞成他的主张。吴永枏就是赞成者之一。他在四川哥老会中有很高的地位，这时在吴玉章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他知道弟弟的想法后，说：“你要做会党工作，必须参加进去，且先补个‘老幺’吧。然后一升‘老五’，就能在实际上管事了。”吴玉章在大哥的介绍下，入了袍哥（即哥老会）。此后，吴玉章在“大爷”之间进行联络工作。四川的“大爷”有张百祥、唐洁、吴永枏3人，湖南的焦达峰，湖北的孙武、居正，江西的邓文辉，广东的熊越山等人，或是“大爷”，或是会党中地位较高和较积极的人，经吴玉章等人联络，终于围坐在一起了，并决定成立共进会，推吴永枏为共进会的临时主席（会党中叫“坐堂大爷”），而吴玉章则升为“管事”，负责筹备过程中的组织联络工作。不久，共进会在日本正式宣告成立。

共进会成立后，吴玉章本想为该会尽更大的义务，多做些工作，没有想到《四川》杂志这时遇到了麻烦。

清政府取缔了国内的进步刊物，以为没有事了。《四川》等杂志在日本不仅宣传革命，而且还进行革命的组织工作，这终于激怒清廷，欲除之而后快。1908年

秋，奉天巡抚唐绍仪被清廷指派为专使，出访美国。唐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路过日本时，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和《四川》杂志。日本政府这次倒很配合，控告《民报》“激扬暗杀，破坏治安”，处以罚金，禁止发行。《四川》杂志因受“赤旗事件”的牵连，处理更为严重。

“赤旗事件”的由来是，1908年6月22日，日本各派社会党人，无政府党人在东京锦辉馆开会，因争夺赤旗（红旗）与警察发生冲突，致使多人被捕。后来，在拘留所里又发现了颂扬法国大革命时将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的诗句。《四川》杂志在第4期上以《赤旗事件》为题报道了这一情况。日本政府认为报道将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的诗句，是在影射，侮辱天皇，以不敬罪判处作者惩役3年的重刑，并开庭审理了《四川》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吴玉章。

本来，1908年暑假后，吴玉章休学的期限已满，已回冈山继续上课。经大家讨论同意，他把《四川》杂志交给了当时的四川留日学生同乡会长、同盟会员廖希贤，由他继任《四川》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因此，《四川》杂志被控，理应由廖出庭受审。廖希贤知道这次出庭受审凶多吉少，因为日本政府是想通过这件事杀一儆百的，因此不肯去，把责任推在吴玉章身上。廖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当时有一个叫童慎如的人坚决不让吴玉章去。吴玉章想：见义不为，无勇也，到法庭有什么可

怕呢？于是毅然要去受审。大家很感动，特地为他请了有名的日本律师樱井来替他辩护。

开庭那天，吴玉章特意换上了新衣，泰然自若地走上了被告席。很多留日学生要跟着去旁听，被法庭阻止。法庭的理由是：案情严重，禁止旁听。大家非常愤怒，并为吴玉章担心，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在外边等候消息。

开庭了。检查官宣布吴玉章有四大“罪状”：一是鼓吹革命；二是激扬暗杀，三是煽动日本殖民地反对日本帝国，四是反对天皇。说到天皇时，检查官还立正敬礼，以示尊敬。

接着是被告人的律师进行辩护。那天，樱井不知为何没有来，吴玉章的辩护律师是樱井临时请来的，双方都不认识。律师的辩护很有道理，他指出：“鼓吹革命，在异国不能构成罪案；登了无政府党的文章，并不能说是激扬暗杀；只有第三、第四两条确是不对，但都系转载不慎，只能算是过失，不能定罪。”

律师讲完，下面立刻乱作一团，众人大哗。有正义感的日本人说：“讲得对，凭什么随意审判人？”也有人怒气冲冲，指着律师说：“你替那个中国穷小子说话，你还是不是日本人？”主持人看到这种场面，要大家冷静，并宣布休庭半个小时。

半小时后，继续开庭。法官出来宣判，说根据“罪

证”，决定查禁《四川》杂志，并科罚金 100 元，处编辑发行人吴玉章有期徒刑半年。又假仁假义地说：姑念该编辑发行人尚在求学，准予“犹豫(缓期)执行”。

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了。吴玉章慢慢走出法庭，刚到门口，久已守候在门外的朋友们立即围住他，夸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为他终于没有“享受”坐牢的待遇而祝贺。

通过这件事，吴玉章切身体会到，日本帝国主义是和清政府沆瀣一气的，对中国革命施行压迫，所谓“审判”、“辩护”、“判决”等等，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

革命军火商

1910年春，同盟会发动的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了。这年冬天，在槟榔屿的热带丛林中，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约集南洋各埠代表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广州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会上，大家商定了起义的日期、地点及准备工作。

革命党人屡遭失败，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愈挫愈奋，要发动他们再次起义，是没有问题的。准备工作中，比较棘手的问题一个是筹款，一个是购买军火。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影响很大，他亲自到海外募捐，不久，将各方捐助汇集起来，约有20万元。剩下的问题就是购买军火了。

革命党人的军火，历次主要都是来自日本。这一次也是如此。开始，安排在日本购买军火的负责人是广东人黎仲实。黎仲实在日本人地生疏，困难重重。一日，黎将实情告诉了四川内江人喻培棣（喻云纪之弟）。喻

将此事告知四川籍同盟会员，看是否另有合适人选来负责采购枪支。大家一致认为吴玉章年龄较大、阅历较多，并且与日本民党关系不错，由他操办此事最为合适。其他几省的同盟会员了解到这一情况，也认为吴玉章是最佳人选。

当时，吴玉章在北京营救因暗杀满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而被捕的汪精卫不成，经上海来到了香港。他找到黄兴和喻云纪，开始参与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喻云纪从弟弟喻培棣处得知缺乏在日本购买军火的人选时，首先想到的也是吴玉章。他将此事汇报给黄兴，黄兴同意了。

喻云纪在香港设立了一个专门制造炸弹的机关，吴玉章担起了在日本购买军火的重任，两位老朋友，开始了分工合作。

吴玉章于1910年底到达日本。刚抵东京，同盟会员们即在“竹庐”集会，商讨购运军火的具体事宜。集会结束后，吴玉章一面与民党接洽购买军火事宜，一面寻找空房子，以供收藏、转运军火之用，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多而不杂，忙而不乱。

购买军火既要仔细、秘密，又要果断、大胆，否则就会出问题。吴玉章负责购置的第一批军火血本无归，原因就在于手下的人未能灵活地掌握这一点。

第一批军火共有手枪115支，子弹4000发，交湖

南人周来苏、萧绍南运往香港。香港本为无税港口，从来不检查往来旅客的行李物品，所以这批军火是当作行李运送的。吴玉章在横滨港口送走周来苏等人，回到寓所，即收到黄兴的电报，电文说：香港近日曾对美国总统号轮船上的行李进行检查，务请注意。吴玉章看完来电，心头一紧：周来苏等人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号！他即刻派王希闵赶赴长崎，把周来苏等人的船票换为头等舱，以避免检查。

王希闵受命后，从东京搭火车到神户，渡海后乘火车到长崎。等了一天，美国总统号轮船才到。他帮周来苏等人换好船票，并传达吴玉章的指示：船到上海不进口，抵香港有人接，如遇非常情况，自有人应付，不必慌张。并交给他们 200 元钱，作应变之需。

事情本来会万无一失的。谁知周来苏胆小如鼠，船过门司后，他害怕起来，把这批精良的手枪子弹偷偷地、一件一件地扔进大海。船到香港，根本没有检查。香港同志听说周来苏已押械抵港、不胜欢欣，见到周后，才知道空欢喜一场。周来苏本人也感到不安，忸怩地向黄兴报告。有人沉不住气了，不禁大怒，掏出手枪要毙了胆小的周来苏，为黄兴所阻。大家不悦之余，便给周来苏取了一个外号，叫他“周丢海”。

吴玉章听到这事，心情很沉闷。这样一来，他续购军火的任务就十分繁重了。